

传译与汇流：西域与中国佛教的互动

李 四 龙

Translation and Convergence: Buddhist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China and Xi Yu(the Western Regions)

Silong LI

Abstract

Xi Yu(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transfer stations for the spread of Buddhism from India to East Asia, and were the main sources of Chinese Buddhis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incipal contributions of Buddhist monks from Xi Yu(the western regions),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troduction of Buddhist precepts, teaching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schools or sects. At the same time, various Buddhist art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Buddhist temples were also introduced in central China. Meanwhile, Chinese Buddh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were also gradually transmitted from central China to Xi Yu(the western regions); consequently, Buddhism in those areas reflects the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cultural traditions. Mongolian and Tibetan Buddhism spread widely in the area of Xinjiang, especiall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historical religious patterns of Northwest China.

印度佛教主要是经陆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最后形成特色鲜明的汉传佛教。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是“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的佛教中转站：既是中国佛教的源头活水，很多高僧来自西域；同时，一批中国高僧冒着生命危险西行求法，有些仅仅是到西域取经，并没有抵达印度本土，这也导致中国内地佛教回流到西域。正是在这样的东来、西行之中，西域成了南亚印度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乃至欧洲古希腊文明、中东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会之地，西域佛教呈现出多元汇流的特色。

一、作为中国佛教源头的西域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西域”所指的范围比较笼统。该词最初出现在《汉书·西域传》，而在此前的《史记·大宛列传》已经记载西域诸国⁽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里所说的“西域”，是指阳关（甘肃

敦煌西南约 140 里）、玉门关（甘肃敦煌西约 160 里）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中亚的全部、西亚和南亚的大部，以及北非和东欧的一部，甚至可以包括今天的罗马，这是广义的“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葱岭（Pamir，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区，也就是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新疆，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本文所指的西域，主要是指广义的西域⁽²⁾；狭义西域，有时以今天的中国新疆代称。

根据现有的史料，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新疆的和田地区，约在公元前 70 年左右。当时，迦湿弥罗高僧毗卢折那，来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传播佛教，于阗国王为这位外来的僧人建造了一座寺院⁽³⁾。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佛教最早传入新疆的说法，但有学者认为，佛教最晚在公元前 122 年已经传入龟兹，今天的中国新疆库车⁽⁴⁾。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历史上说法虽然很多⁽⁵⁾，但被普遍采用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

是“伊存授经”说，认为公元前2年汉朝人从大月氏人那里已对佛教有所了解，中国的学术界现已大多采纳这种说法；另一种是“汉明求法”说，认为佛教是由汉朝皇帝派使者请来的，公元67年，这个皇家使团从西域携带佛经与外来高僧回到当时的都城洛阳，中国的佛教界基本沿用这个传统说法。尽管很多信息并不确切，但西域作为中国佛教的源头，应该是可靠的说法。

与今天中亚的宗教格局不同，中亚、西域一带很早就是佛教的传播区域。最晚到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执政时期，佛教已经传到印度的西北部、阿富汗等地。相传，阿育王派遣末田底迦（Majjhantika 末阐提）到罽宾、犍陀罗等地传播佛教⁽⁶⁾。公元前138年，中国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国，想要联合这个民族共御匈奴。当时，佛教在西域已有相当广泛的传播。事实上，在此以后的数百年间，这个民族与中国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公元2世纪下半叶，大月氏人支谶到达洛阳，传译大乘佛经，一直到南北朝初期罽宾高僧传译说一切有部经典，都与大月氏这个民族有关。即使是在故事内容模糊不清的“伊存授经说”里，出现的西域民族也是大月氏人。而在“汉明求法说”里，中国使臣也是到大月氏以后携金像返回汉地。

在大月氏国力强盛之时，西域诸国，如安息、康居，全都臣服于月氏人。帕米尔高原，当时是佛教的天下。可以说，大月氏是中国佛教最初的源头。汉明帝感梦求法的重要成果，是请回了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这部佛经的原本据考证应以大夏文写成。而从后来支谶的译经来看，大月氏国主要流行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经》。

当然，中国佛教的源头还包括同在西域的安息国。该国位于古代的帕提亚（Parthia），大体是现在的伊朗。在张骞出使大月氏归来时，安息已是西域最大的强国，位于大月氏国之西。中国佛教传入之初，著名译经高僧安世高，即为安息国王太子。汉灵帝末年，还有安玄到达洛阳，因功受封为骑都尉。昙无谶、安法延、安法贤、安法钦等，是在三国时期在中国活动的安息国佛经翻译家。

中国早期的外来僧人，主要是胡僧，也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而不是印度本土的僧人。他们的名字通常被冠以族名，表明他们的来历。譬如：安世高，“安”姓表示来自安息国；支谶，“支”姓就表示来自大月氏国；康僧铠，“康”姓表示来自康居国；昙无谶，“昙”姓表示来自印度；竺法兰，“竺”姓表示印度。当然，

他们的中国学生也有可能随师父的姓。依据统一姓氏之前的僧人名号，我们可以推算出早期中国佛教的主要来源。在东汉、三国的时候，外来的僧人主要来自安息、大月氏、康居三地，其他的相对较少。而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来自罽宾、中印度的僧人相对较多。

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前面已经提到了两座重镇：于阗、龟兹，分别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与北道的要塞。新疆的这两个地方，对中国内地佛教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以往讨论西域与中国佛教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指以于阗、龟兹为代表的狭义西域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影响。实际上，现在的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原政治势力的影响之下，有时当地的强势民族还会去中原谋求发展，甚至还想夺取中原建立政权。所以，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看，新疆佛教与中原佛教应被视为统一的整体，它与广义上的西域佛教有所不同。

大约从公元1世纪下半叶开始，于阗在丝路南道取得了优势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上，这个地区的佛教信仰与中国内地的大乘佛教有着直接的联系。最著名的是，三国时期朱士行西行求法，在于阗获得《放光般若经》的故事。这说明，中国的内地从于阗获得梵文佛经。事实上，还有很多传到中原的佛经，直接是以西域当地的语言书写的。

龟兹，是丝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充当着绿洲贸易的中转站。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诸国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必过龟兹。大月氏高僧东进汉地，龟兹也是必经之地。佛教是龟兹的国教，公元3世纪，境内已有塔庙千所；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遥遥相望，成为当时西域南北两大佛教中心。此后有龟兹僧人到内地翻译大乘佛经，最著名的龟兹僧人当数鸠摩罗什（Kumarajiva, 344-413），被列为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

除了于阗、龟兹，西域的其他地方，像疏勒（今新疆喀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历史上都曾流行佛教，同样也对中原佛教产生较大的影响。西域佛教，因此是中国内地佛教的经典与思想源头。新疆既有印度来的佛教，也有自己本地的佛教，这种混合形式的佛教，影响了中国内地佛教的早期发展。

二、西域高僧对汉传佛教的卓越贡献

到了中国内地的西域高僧，以鸠摩罗什为代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卓越的贡献，简单地说，可以有三方面的表现。

1. 传译经典

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佛教翻译主要是由外来僧人主持，他们主要来自西域。东汉末年，安世高到洛阳译经弘法，主要翻译小乘禅学，包括《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等。稍后不久来到中国的支谶，在洛阳翻译大乘经典，主要传播般若经的空性思想。他译的《道行般若经》，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佛教此后的思想路线。

三国以后，直到隋唐时期，西域来华的高僧很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东晋末年，罽宾或迦湿弥罗来华的僧人，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佛陀耶舍、佛陀什、昙摩密多、求那跋摩等，他们在中国翻译说一切有部经典或不同部派的律藏，满足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对毗昙学、戒律学的迫切需要，意义深远。

在所有早期来华的外来高僧中间，鸠摩罗什是最杰出的一位，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几乎达到无人能比的地步。这位新疆库车人，幼时曾经跟随母亲到过罽宾，对当时西域的各派佛学都有涉猎。后来辗转来到中国的首都长安，系统地传译般若学与龙树中观思想，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国家支持的翻译机构一译场。他还在长安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最多的时候，门下的弟子多达三千人，南北朝初期，中国的南北方到处都是他的学生。

2. 传授戒律

佛教在中国的译传，并不单纯是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佛学思想的输入，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移植，即“僧伽”或“寺院”制度的融入。随着僧尼、寺院数目的激增，寺院经济不断膨胀，僧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变得相当明显。佛教被认为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影响国家的政局稳定，伤害儒家的孝悌伦理，政府主张淘汰部分僧人，要他们遵守儒家礼仪。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佛教的存在需要严格的自我约束，这就需要佛门的戒律制度、修禅实践。中国的第一部佛门戒律，是公元250年中印度人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僧祇戒心》。而在他来华以前，中国僧人不过是出家削发而已。仅在几年内，就在洛阳白马寺，西域康居国的康僧铠，译出了《昙无德律部杂羯磨》；西域安息国的昙无谖，还完成了一个异译本《昙无德羯磨》。这些戒律的译出，解决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燃眉之急。东晋末年，一批罽宾僧人翻译律藏，再度为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传授禅法

在修禅方面的传承，西域僧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最初是安世高传承数息观，直到后来鸠摩罗什传承五门禅法，可以说，历代僧人来华，都会口传身教，介绍这种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属于养生方术的印度禅法。

有了上述这些基础以后，中国佛教后来创立宗派，也就水到渠道，极为自然。这里有西域僧人的杰出贡献。

三、汉藏佛教的汇流

西域，特别是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历史上经常处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影响之下，也曾一度被吐蕃、蒙古占领，因此受到汉、藏、蒙古文化的影响。在各地僧人的流动过程中，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佛教汇聚西域，形成多元汇流的格局。

大量佛教石窟、塔寺、造像的遗存或遗址，探险家们发现的大量不同语种的佛教文献，都已证明：西域，是各种佛教汇流的地方。在中国的早期佛教史上，新疆佛教与中原佛教实际上同步发展、相互影响。

若以龟兹为例，这种佛教之间的汇流现象十分明显。龟兹是汉唐时期西域诸国中的大国，中原政权大多是以龟兹作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公元7世纪，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这里的佛教，既有龟兹的本地佛教系统，也有从中原西传的汉地佛教系统。

佛教刚到龟兹，早期应该流行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思想。直到公元4世纪中叶，龟兹仍以小乘佛教为主。甚至到了唐代，龟兹仍还盛行小乘佛教。然而，鸠摩罗什的出现，使当地的佛教有了转机，开始流传大乘佛教。7世纪以后，唐朝在龟兹设置安西大都护府，中原的大乘佛教随着也传到龟兹，与当地的小乘佛教，并行不悖。

总体而言，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新疆佛教，大、小乘佛教并存，同时流行。分别而论，丝绸之路南道以大乘佛教为主，北道则以小乘为主。新疆的那些沙漠绿洲，实际上是中原佛教与西域佛教的交流中心。这种文化的交流，或许还不仅是双方的共存与包容，还可能有些彼此沟通的产物。有的学者认为，有些佛经是在西域写成的，而不是完成于印度本土。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以往被认为是中国疑伪经的佛经，很可能是在西域因受中国文化的思想影响而创作的。譬如，中国的方广铎教授就此提出了“文化汇流”的概念。

众所周知，佛教在西域后来逐渐衰落。然而，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藏传佛教，到元明清时期，缘于蒙古人在西北的崛起，它在新疆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西域与中国内地的佛教，尤其是在元朝与清朝，因为藏传佛教而再度发生密切的交流。

约在中国的北宋初期，藏传佛教在西域或许已经开始流传。考古学家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了属于藏传佛教的“欢喜佛”，被认定是公元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的文物⁽⁷⁾。在于阗、高昌回鹘等王国相继灭亡的过程中，吐蕃人当时给西域的佛教徒提供了有力的庇护。到了元代，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在西域所向披靡，藏传佛教因此也有很快的传播。西域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格局，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并存，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两家的影响最大。新疆地区的佛教，除了历史上的本土佛教，因此还有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卫拉特⁽⁸⁾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大体是以新疆伊犁为中心，在西域广泛传播，甚至在中国清朝初年还影响到青海、西藏的佛教格局。

在西域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上，以往的视野主要集中在汉传佛教上。所以，一旦把藏传佛教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西域佛教的多样性、丰富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值得今后重点研究。

结 语

站在世界佛教史的角度，西域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东亚的中转站；站在东亚佛教史的角度，西域是中国佛教的主要源头，在历史上承担了传译、流通佛典的功能，并将佛教的寺院组织制度、禅修方法、佛教艺术等传入中国内地。

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一旦进入东亚儒家文明圈以后，其所形成的汉传佛教，又有许多自己的特色，逐渐回流到西域，特别是在隋唐时期的新疆地区，丰富了西域佛教的历史内涵。约在公元10世纪以后，代表印度中晚期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逐渐在西域流传，至今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二大宗教。

今天的西域，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区域。然而，在这些地方留存的很多佛教遗迹，考古发现的很多不同语种的佛教文献，展现了西域在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文明沉积，让人回想起佛教为了这片土地的和平、繁荣所曾发挥的积极作用。

注释

(1) 据考证，《史记·大宛列传》已经出现“西域”的说法，但其所指是匈奴西部领地。

(2) 广义的西域范围太广，因此，近代西方学者提出“中亚”(Central Asia)这个地理概念，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

(3) 参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4) 参见魏长洪等：《西域佛教史》，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列举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说法，颇为详尽。

(6) 时间应在阿育王继位的第十一年或翌年，有的学者定为公元前259年或次年。参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页。

(7) 参见魏长洪等：《西域佛教史》，第206页。

(8) 卫拉特，是蒙古语Oyirad的音译。元朝译作“斡赤剌惕”、“外刺”等，明朝译作“瓦刺”，清朝译为现名，有时也称“西蒙古”。国际上将这一蒙古部族称为“卡尔梅克”。